

浙江文叢

臧懋循集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臧懋循集



〔明〕臧懋循撰 趙紅娟點校

古籍出版社
出版聯合集團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臧懋循集 / (明)臧懋循撰;趙紅娟點校. —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2. 3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80715-813-4

I. ①臧… II. ①臧… ②趙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
集—中國—明代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國—明代
IV. ①I214. 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021095 號

臧懋循集

[明]臧懋循 撰 趙紅娟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陳小林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21.25

字 數 200 千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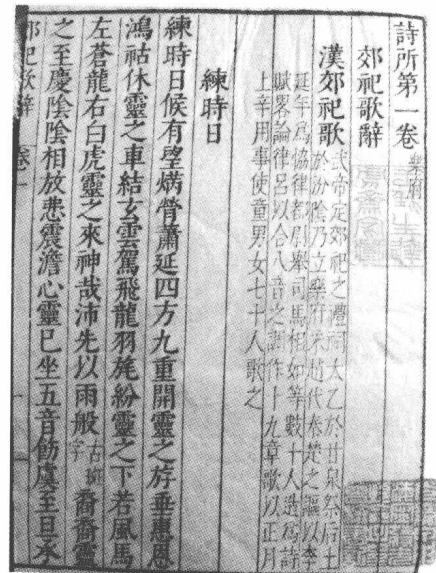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813-4

定 價 110.00 圓(精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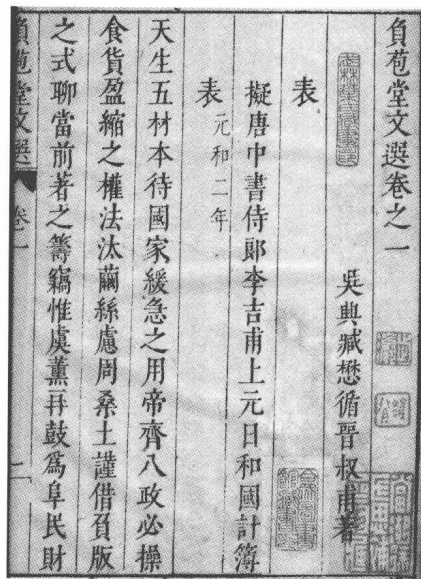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ISBN 978-7-80715-813-4





明萬曆刻本《詩所》書影



明崇禎刻本《負苞堂文選》書影

前言

趙紅娟

臧懋循（一五五〇—一六二〇），字晉叔，號顧渚，浙江長興人。與同郡吳稼澄、吳夢暘、茅維合稱『四子』，著名於當時。浙江長興臧氏爲魯公子僖伯之後，世居山東。晉時臧榮緒爲京口教授，遷徙無錫。宋代時，進士臧含文始從無錫遷浙江長興。傳十三世至思聰，思聰生璫，字潤庵，是爲臧懋循之高祖。璫無仕宦經歷，但其兄瓊字澹庵，以《易》中天順己卯（一四五九）浙江鄉試舉人，成化己丑（一四六九）成進士，授工科掌印給事中、河南布政使參政，封中議大夫。璫生維，字菊坡，鎮江衛副千戶，爲臧懋循曾祖。維有二子：應奎、應壁。應奎，字賢徵，號損齋，正德丙子（一五一六）舉人，丁丑（一五一七）進士，歷任南兵部車駕司主事，北禮部精膳、清吏司主事。在禮部時，曾就學於著名學者湛若水。嘉靖三年（一五二四），因議興獻禮，遭廷杖而卒。隆慶時平反，追贈光祿寺少卿，其師湛若水銘其墓。應壁爲臧懋循之祖，字休徵，號益齋，嘉靖己酉（一五四九）歲貢，授光祿寺署丞。應壁有三子：繼芳、繼華、繼薦，其中長子繼芳即臧懋循之父。繼芳字原實，號堯山，嘉靖庚子（一五四〇）舉人，癸丑（一五五三）成進士，歷官工部虞衡司員外，直隸、松江、鄖陽知府，河南按察司副使。繼芳三子懋德、懋衡、懋循中，唯臧懋循科第最顯，中萬曆庚辰（一五八〇）進士。懋循叔繼華出身舉人，任都察

院都事；其子懋中爲萬曆戊戌（一五九八）進士，歷官廣西按察司僉事；懋中六子，其中長子炆如、次子燠如在萬曆丙辰（一六一六）這一年同成進士，而且燠如還是會魁。可見，從臧懋循伯祖應奎、臧懋循父繼芳，到臧懋循、臧懋中從兄弟，再到懋中之子炆如、燠如，長興臧氏在明代正德、嘉靖、萬曆間是一門四代六進士。加上成化間，臧懋循高祖輩臧瓊，在明代共是七進士。再加上與湖州望族竹墩沈氏、烏程韓氏、晟舍閔氏、德清蔡氏、孝豐吳氏等的聯姻，長興臧氏家族在明代的繁榮興旺自不待言。

臧懋循生於嘉靖二十九年庚戌（一五五〇），自幼穎異。三歲時就能背誦《孝經》、古詩，五歲占對如流，九歲寫文章，其師就自愧不如，弗敢任教。爲其父同事吳維嶽所賞識，許以其弟吳維京女，是爲臧懋循元配吳孺人。吳氏是湖州孝豐的名門望族。維嶽、維京兩兄弟及其父吳麟、叔吳龍，皆於嘉靖年間中進士，時稱『父子叔侄四進士』。特別是維嶽擅長書法，精通文學，尤卓於詩，聲名最著。與王世貞、李攀龍等倡詩社，爲『嘉靖廣五子』之一，著有《天目山齋歲編》、《奏議》與《海岱集》等。臧懋循妻所處時代正是吳氏家族最輝煌的時期。臧懋循十四歲時，母親去世。不久，祖母又去世，父親臧繼芳從松江太守任上奔喪歸。由於爲政清廉——臧懋循曾多次提到自己爲清白吏子孫，加上幾經喪事，臧繼芳囊中羞澀，竟不能爲其子完婚。吳維嶽仗義相助，治裝以嫁，時臧懋循十六歲。其後，臧繼芳補鄖陽知府，擢河南按察司副使，卒於官。十九歲的臧懋循千里奔喪，扶柩而還。

父親捐館後，叔繼華體弱，不任家政，祖應璧析產授諸孫。臧懋循於是發奮讀書，以求出人頭地。一開始學的是《易》，後改《禮》。二十二歲補邑庠生，二十四歲成舉人，但二十五歲、二十八歲，兩次春試不第。於是馳志詩文，結交友朋，甚至徵歌選妓，飲酒蹴鞠，日日沉溺於聲色之中。三年後的萬曆庚辰（一五八〇），臧懋循始與同郡董嗣成、章嘉禎等十三人共成進士。這是湖州科舉史上的盛事，湖州城定安門內立起了『十三進士』牌樓^(一)。次年，臧懋循出任湖北荊州府學教授。萬曆十年壬午（一五八二），被委派為南京國子監鄉試同考官。事畢，改署湖北夷陵知縣。在任期間，鋤強扶善，『孳孳問民疾苦』^(二)。次年，遷為南京國子監博士。任職期間，時與名人韻士遊覽六朝遺跡，命題分賦，吟詩作曲。『每出必以棋局、蹴毬繫於車後。又與所歡小史衣紅衣，並馬出鳳臺門』^(三)。這種風流狂誕的行為雖然是晚明社會的一種普遍風氣，但還是為禮法之士所不容。萬曆十二年（一五八四），禮部主事屠隆（字長卿）就因與西寧侯宋世恩『淫縱』而被劾，削籍歸鄞。次年五月，臧懋循也同樣因好男風而被國子監祭酒黃儀庭彈劾，從而結束了短暫的仕途生涯。同日，南京戶部主事唐仁卿因為談道論經而被貶。臧懋循、屠隆、唐仁卿三人都是湯顯祖的同僚好友，湯氏此時正在南京任職，因寫詩贈別曰：『君門如水亦如市，直為風煙能滿紙。長卿曾誤宋東鄰，晉叔詎憐周小史。自古飛簪說俊遊，一官難道減風流。深燈夜雨宜殘局，淺草春風恣蹴毬。楊柳花飛還顧渚，簪酒茗魚須判汝。興劇書成舞笑人，狂來畫出挑心女。仍聞賓從日紛紜，會自離披一送君。却笑唐生同日貶，一』

時臧穀竟何云。』^{〔四〕}詩歌不僅生動刻畫了臧懋循在南京的風流生活，而且對這種行爲表示了一定的理解，『一官難道減風流』，更何況唐仁卿談道論書，最後不也是同樣的結局嗎？關於中白簡罷官這件事，《墓誌銘》言臧懋循『怡然不以屑意』，且說：『籠陽羨之茗，網五湖之鱸，課山田杭秫，備甘旨而實尊壘，吾願足矣。』^{〔五〕}臧懋循在給友人的信中亦曰：『僕少無鄉曲之譽，長多佻撻之癖，譬如沐猴而冠，其不能久假，明矣。今日見褫，大是本懷。』^{〔六〕}這雖然只是一種自我安慰，但其放誕不羈、不能忍受官場束縛却是事實。

臧懋循罷官歸家後七日，生母丁氏卒，遠近弔唁，加上家中本來人口就多，舊宅已不能容納，於是謀創新居。此時正碰上災荒，臧氏供應糧食，請飢餓者來做工，不僅很快落成了新居，而且救活了不少飢民。萬曆十六年（一五八八），從兄懋中鄉試中式。臧懋循覺得家中已有重振門庭之人，於是更加放任江湖。他特製了一隻小船，裏面日常用具齊備。浮家泛宅，所至登高集勝，尋幽弔古，飲酒賦詩，率意寄興。交遊也很廣，著名者有馮夢禎、屠隆、湯顯祖、潘景升、謝肇淛、曹學佺、吳夢暘、李維楨、尹子恒、汪仲嘉、梅子馬、陸伯生等。

臧懋循是內閣首相申時行的門生，又是前首相徐階孫子的岳父。他本人、一子和兩孫娶的都是知府之女。因此，儘管罷官後未再出仕，但憑藉婚姻、師友等關係，他依然過著賦詩徵酒的優閑生活，不時地往來於南京、杭州之間。其中主要的一些活動有：萬曆二十四年（一五九六）四十七歲時，遊歷黃山、白岳；萬曆二十八年（一六〇〇）七月，與俞安期、馮夢禎等十五

人結社於西湖；萬曆三十四年（一六〇六），與曹學佺、吳夢暘等爲金陵社集。臧懋循最後卒於萬曆庚申（一六二〇）二月，享年七十一歲。兩年後的天啓壬戌（一六二二），與元配吳氏合葬於安吉蘇門山。

由於半生時間賦閑在家，所以臧懋循著述甚豐。據一九三四年甲戌重修《臧氏族譜》卷一《藝文志》所載^{〔七〕}，撰著有《文選補注》十五卷、《負苞堂集》十二卷、《負苞堂稿》九卷、《金陵社集》八卷、《元律令》一篇、《棋勢》十卷、《六博碎金》九卷；編刊有《元曲選》一百卷圖一卷、《唐詩所》四十七卷、《古詩所》五十六卷；校刻有《兵垣四編》及《附編》、《仙遊錄》、《夢遊錄》、《俠遊錄》；另外還刪訂《玉茗堂傳奇》四卷，改定《墨花記》，校正《古本荆釵記》。以上記載中，《墨花記》當是《曇花記》之誤，它是時人屠隆的作品。據筆者考證，臧懋循並無刊刻《兵垣四編》之舉，其工作是輯評、校閱。他這個輯本後來被其外甥閔聲所得，纔由閔聲與其侄閔映張共同刊行出來，時間是天啓元年^{〔八〕}，此時臧氏已卒。至於湯顯祖《玉茗堂傳奇》，臧懋循則不僅刪訂過，而且予以評點並付之剞劂。其初版《雕蟲館校定玉茗堂新詞四種》，現存美國加州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^{〔九〕}、英國倫敦博物院圖書館^{〔一〇〕}。另外，據筆者所見，臧懋循還曾主持《元史紀事本末》的校刊工作，參與閔聲、閔映張所刊《董解元西廂記》四卷的點定工作等。

臧懋循有七男二女、八孫男、六孫女，因爲人口衆多，加上子女婚嫁頻繁，經濟上頗爲困

頓。其《與曹能始書》曰：『弟人春來，爲第四子娶婦，空囊本不能有所營辦，而婦家又不見憐，往往求多，幾至析骸決腦矣。』又其《寄姚通參書》曰：『弟播棄以來，值歲之不時，更爲婚嫁所累，先人遺產蕩不復存，乃汗漫江湖，傭文自活。窮途灑泣，誰見憐之？』可見其書籍編刊的主要目的是爲了賺錢養家。有關臧懋循刻書的發行銷售情況，所存材料很少。大致是，刻好後，一邊派家人去南京發賣，一邊送書給南京友人，請他們在圈子中幫忙宣揚。若有人購買，則馬上派人送書過去。因爲財力有限，而大部頭著作的刻書費用又很大，所以他一般是先刻一部分，等賣得錢，支付掉前集的出版費後，纔謀刻後一部分。其《寄黃貞父書》曰：『刻元劇本擬百種，而尚缺其半。蒐輯殊不易，乃先以五十種行之，且空囊無以償梓人，姑藉此少資緩急。茲遣奴子賁售都門，亦先以一部呈覽，幸爲不佞吹噓交遊間，便不減伯樂之顧，可作買紙計矣。倘有所須，自當續致，不敢以此啖丈也。』又《寄姚通參書》曰：『弟雕蟲之嗜，老而不衰，以其暇輯古詩、初盛唐詩若干卷，命曰《詩所》。竊附於雅頌各得之義，敬以奉覽。別遣奴子賁售都門，將收其值，以給中晚唐詩殺青資斧。幸丈留意，於長安貴人及計吏間多方借之吹噓，是即詩林大檀施，不獨弟一窶人懷感已也。』臧懋循分集出版的策略，也是基於商業盈虧的考慮。如果前集的銷路不好，後集就可不出，以減少虧損。

刊刻書籍不僅有利可圖，而且能留名於後世。臧懋循曾言：『平生溺好雕蟲篆刻，此雖壯夫不爲，而小技倘成不朽。』^{〔二〕}臧懋循以所刊《元曲選》知名於後世，可謂不出自己所料。《元

曲選》分前、後兩集，前集刊行於萬曆四十三年（一六一五），後集刊行於萬曆四十四年（一六一六）。每集收雜劇五十種，全部共一百種。其中包括元人雜劇九十四種，入明的元人作品六種。在各種同類選本中，作品數量之多則僅次於《也是園古今雜劇》。現存選本如李開先《改定元賢傳奇》，陳與郊《古名家雜劇》、《新續古名家雜劇》，繼志齋《元明雜劇》，各為三至八種不等；元刊《古今雜劇》、息機子《雜劇選》、顧曲齋《古雜劇》、孟稱舜《柳枝集》等，最多不超過三十種，有的還包括明代作品在內；《古名家雜劇》正續編，連同脉望館《古今雜劇》所收《古名家雜劇》，共六十五種，也只佔《元曲選》的三分之一，而其中明代作品在三分之一以上。《也是園古今雜劇》抄本、刻本共二百四十二種，其中一百四十四種編為《孤本元明雜劇》，但其中可以確信為元代作品的不超過五十種。而且也是園所藏雜劇數量雖多，但名作很少，流傳不廣，其影響遠不能與《元曲選》相比。在《元曲選》中，除《西廂記》因當時刻本繁多而不重出外，元雜劇的精華作品可以說都已經網羅在內，很少遺漏。《元曲選》所收《灰闌記》、《陳州糶米》、《虎頭牌》、《謝金吾》、《凍蘇秦》、《昊天塔》、《救孝子》、《伍員吹簫》、《東坡夢》、《秋胡戲妻》、《抱妝盒》、《神奴兒》、《爭報恩》、《馮玉蘭》、《來生債》等十五種作品，還是孤本。可以說，沒有《元曲選》，它們就不能流傳到現在。不僅如此，《元曲選》所採用的底本通常也是最好的，校讎和刊刻的質量也是最精良的。臧懋循不僅自己藏有許多戲曲秘本，而且向湖北劉延伯等各地收藏家訪求了很多善本，其中不少是宮廷中所用的『御戲監本』。他對各種版本作

了細緻的比較，擇其精者進行校訂和整理，因此《元曲選》的訛誤很少。其所收作品，體例一致，正襯清楚，科白齊全。每折之後還附有『音釋』，為雜劇欣賞、演出和研究提供了方便。除此之外，《元曲選》前還有不少附錄，有《天台陶九成論曲》，談角色名目來源、北雜劇常用的五宮四調的五百多種曲牌等；有《元曲論》，涉及雜劇音律宮調、元代雜劇家、雜劇名目、知音善歌之士等內容；還有《燕南芝庵論曲》、《高安周挺齋論曲》、《吳興趙子昂論曲》、《丹丘先生論曲》、《涵虛子論曲》等。這些都是元代及明初的一些重要的戲曲論著。『正因為如此，三百多年來《元曲選》幾乎成為唯一選本兼全集本而為讀者所接受』，『它在文學選本中佔有的崇高地位只有南朝蕭統的《文選》可以比美』^{〔二〕}。後代讀者因《元曲選》纔得以全面享有元代雜劇的光輝遺產，而當時不受重視的書會才人的絕代才華，也因《元曲選》的存在纔不至湮沒無聞。這就是臧懋循最偉大的歷史貢獻。

臧懋循編《元曲選》時對元雜劇有修改。其《寄謝在杭書》曰：『比來衰懶日甚，戲取諸雜劇為刪抹繁蕪，其不合作者，即以己意改之，自謂頗得元人三昧。』對此，歷來頗多詬病。明人王驥德在《曲律》中說《元曲選》『句字多所竄易，稍失本來，即音調亦間有未叶，不無遺憾』。清人葉堂在《納書楹曲譜正集》卷二中更是指責臧懋循是一個孟浪漢：『《（元人）百種》係臧晉叔所編。觀其刪改「四夢」，直是一孟浪漢，文律、曲律皆非所知，不知埋沒元人許多佳曲，惜哉！』^{〔三〕}鄭振鐸將《元曲選》摒棄於《古本戲曲叢刊》之外，其原因之一即為《元曲選》對元雜

劇的竄改^{〔一四〕}。孫楷第在《也是園古今雜劇考》一書中，也批評臧氏『師心自用，改訂太多』^{〔一五〕}。關於臧懋循修改元雜劇的功過，筆者以爲，需考慮到以下三個緊密相關的問題。一是元雜劇原本是否存在。如果說臧懋循的修改使元雜劇失去了本來面目，那麼其前提是存在著所謂的元雜劇原本，但這實際上是存疑的。鄭騫在《臧懋循改訂元雜劇評議》中就說：『雜劇在元代只是流行於社會民間的一種通俗文藝，不是聖經賢傳高文典冊，誰也不理會甚麼叫做尊重原文保持真象，而且經過長時期許多伶人的演唱，更免不了隨時改動。所以，元雜劇恐怕根本無所謂真正的版本，只能求其比較接近者而已。一切改動，更無從完全歸之於某一本書或某一個人。』對此，奚如谷《臧懋循改寫〈竇娥冤〉研究》也持同樣的觀點^{〔一六〕}。二是修改有改好和改壞兩個結果。而根據目前學者們的研究，臧懋循的修改還基本上是使劇本的質量提高的。徐朔方先生就曾說：『以《竇娥冤》和《趙氏孤兒》爲例，臧刻本比別的版本更有資格列於世界大悲劇中而無愧色，如同王國維《宋元戲曲考》所說的那樣。』^{〔一七〕}三是選本質量的高低影響其生命力和傳播效果。如果《元曲選》只是簡單照錄所選文本，那麼從文獻學、版本學的角度看雖然極其有益，但它很可能會因爲粗陋繁蕪而被淹沒於世。如同李玉蓮所說，臧懋循對元雜劇的成功刪改，從傳播學的角度看，『導致的是受衆範圍的擴大，傳播效果的增強』^{〔一八〕}。因此，筆者以爲，即便是臧懋循對元雜劇的修改，也是功大於過。

除《元曲選》等編選校刻的書籍外，臧懋循自著的書現僅存《負苞堂詩選》五卷、《負苞堂

文選》四卷。在明代詩壇上，臧氏頗有聲譽，他與同郡吳稼澄、吳夢暘、茅維並稱『吳興四子』，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、朱彝尊《明詩綜》、陳田《明詩紀事》中均選有其詩作。朱彝尊《靜志居詩話》卷十五贊揚他爲『磊落之士』，雖然與明代後七子之首王世貞讌遊，但詩歌『不墮七子之習』，沒有沾染模擬剽竊之風氣。特別是一些寫景抒情的詩歌，清新可取。其《江上送曹能始別》詩曰：『相望江亭晚，尊空客漸稀。楊花不解別，到處逐君飛。』又《望亭夜泊》詩曰：『向暝投何所，依微識望亭。客舟今復至，津路昔曾經。瑟瑟風吟樹，離離雁度汀。翻令鄉思逼，數起視明星。』其他如《送茅孝若應舉》、《得吳載伯書却寄》等也寫得自然清新，十分喜人，一如朱氏所言，無『七子』模擬之惡習。大概是受到臧懋循本人風流放蕩行爲的影響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百七十九在評其詩歌時，想當然地說：『多綺羅脂粉語，未免近靡靡之響。』在今天，我們倒是願意看到一些能反映當時晚明那種適情縱性的時代特徵的『靡靡之響』，但事實上，這類詩歌在《負苞堂詩選》中並不多見。在某種程度上說，臧氏的詩歌還是較嚴肅和正統的，不少詩歌關心時事，放眼社稷。萬曆二十年（一五九二），寧夏致仕副總兵哱拜叛亂，明政府一開始派去平叛的幾支軍隊都打了敗仗。臧懋循憂愁國事，作《壬辰書事》詩，『傳道靈州事，經年未解紛。尚思蕭相國，空出李將軍』，希望有蕭何、李廣之類的能人出現，早日平定叛亂^{〔一九〕}。同年，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，直逼鴨綠江，明朝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爲經略，東征朝鮮，臧懋循作七律《代送宋司馬》、七言排律《出塞》。次年正月初八日，宋應昌等大捷於平

壤，臧懋循興奮地作七律《聞捷》，曰：『連年遼海事兵車，一月三傳有捷書。』但明軍被勝利衝昏了頭腦，冒險輕進，於二十七日敗於碧蹄館。臧懋循因作《東征詩寄宋司馬》，表達了無限惋惜之情，『傷哉碧蹄役，司馬昧遠圖』。朝鮮戰事遲遲未能平定，最高統治者却窮奢極欲，只知道斂財，派遣礦監稅使，四出搜刮民脂民膏。臧懋循《關河》詩對萬曆皇帝這種置國事於不顧的昏庸行爲，進行了譴責：『關河使者半垂璫，歲歛金錢入尚方。車馬故應愁蜀道，兵戈猶自哭遼陽。』其《己亥書事》一詩對萬曆年間礦監稅使橫行這一弊政也進行了揭露：『水衡少府尚堪供，真是宸居惜費重。已見關河增榷賦，可能山谷借泥封。輜軒使者遙相望，畫省郎官不自容。』

在《負苞堂文選》中，最有價值的是那些詞曲序引，它們充分表達了臧懋循的戲曲理論主張，是戲曲史的寶貴財富。臧懋循認爲詩、詞、曲『源本出於一』，但又有各自的特點。戲曲用語，需六經子史語、稗官野乘語，『雅俗兼收，串合無痕』；戲曲情節千百其狀，人物多種多樣，作者『必須人習其方言，事肖其本色』；戲曲強調音律，需『精審字之陰陽，韻之平仄』。這就是臧懋循在《元曲選後集序》中提出的著名的『作曲三難』說：『情詞穩稱之難、關目緊湊之難、音律諧叶之難。戲曲創作只有做到『事必麗情，音必諧曲』，纔能『使聞者快心，而觀者忘倦』^{〔10〕}。臧懋循還把戲曲作品分爲『名家』和『行家』兩類，稱『名家』以『文彩爛然』見長，而『行家』則以表現上的『摹擬曲盡』爲特點^{〔11〕}。臧懋循注重戲曲的舞臺實踐和對生活情狀的

真實表現，大力推崇的是本色派的元雜劇作品，擇選其中百種而編成《元曲選》，以盡元曲之妙，這是對明代中葉以來曲壇講究藻麗之風的否定。戲曲文詞之典雅駢麗始自高明《琵琶記》，然《琵琶》語言尚能符合人物身份。自嘉靖間梁辰魚作《浣紗記》，遂開啓了靡麗之風，而崇尚華靡的後七子領袖王世貞，又因同鄉之誼，對梁大加吹捧，從而導致了當時吳中劇壇語言綺麗、本色盡失的現象。臧懋循批評汪道昆《高唐夢》、張鳳翼《紅拂記》、鄭若庸《玉玦記》等駢麗派作品，說它們『非不藻麗矣，然純作綺語，其失也靡』，而推崇本色的元人雜劇，說它們『妙在不工而工』，這在當時是有現實意義的。從戲曲的本色觀出發，臧懋循對當時曲壇的一些熱點問題，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。如明代中葉，關於《琵琶記》和《拜月亭》（《幽閨記》）的高下，劇壇上展開了一場大論爭。何良俊在《四友齋叢說》卷三十七中認為《拜月亭》本色當行，遠勝於『專弄學問』的《琵琶記》。而後七子領袖王世貞則認為《琵琶記》有『琢句之工』、『使事之美』，『冠絕諸劇』。可以說，明代許多著名的文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這場論爭。臧懋循贊同何氏《幽閨記》勝於《琵琶記》的說法，認為《琵琶記》【梁州序】『念奴嬌序』二曲是刻意求工之曲，不類高明口吻，是後人竄入；而王世貞以修飾詞章為美，反而對這些贗曲『津津稱詡不置』，譏笑王氏『是惡知所謂《幽閨》者哉』^{〔三〕}。另外，臧懋循對徐渭雜劇語言之鄙俚、湯顯祖傳奇之疎於音律也提出了批評意見：『山陰徐文長《櫛衡》、《玉通》四北曲，非不伉儷矣，然雜出鄉語，其失也鄙；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，而識乏通方之見，學罕協律之功，所下句